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大事提要——

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 大事提要

(1917.11—1943.7)

乌传袞 马宝华 合编

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1985年8月

编者的话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研究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在积累和整理有关资料方面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我们试编了这一本《大事提要》，希图按时间顺序较系统地列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演变的脉络，起到便于查找和提供线索的作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资料也较缺乏，遗漏错讹之处必然很多，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指教和帮助。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党中央和苏联舆论界对中国革命的观点及其变化，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查阅了1919年至1943年期间的全部《真理报》以及部分《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共产国际》杂志，对其中涉及中国革命的重要看法尽可能作出摘录和提示。这可算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只是限于篇幅，未能作更详尽的摘引。

书后附《苏联赴华部分军事顾问名单》，供查阅。

我们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专著、论文、译著和资料，采用了其中不少观点和内容。为了对著、译者表示谢意，特在书后附以《部分参考书目》，同时也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检索。

本书的出版得到安徽省政府顾问、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征田同志和安徽大学名誉校长孙陶林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谢意。

严邦晞同志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温耀平、高和平同志参加了《参考书目》的收集和编纂工作。

AK30/617

一九八五年八月

一九一七年

11月7日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十月革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促进了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自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朝鲜、印度、伊朗、土耳其等东方国家也都先后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1月10日 上海《民国日报》开始刊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此后不断有所报道。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极力封锁，以及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霍尔瓦特等白匪军队和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致使中俄交通阻隔，消息闭塞。但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外国书报杂志逐渐了解到苏俄国内的真实情况，并陆续加以介绍。一些归国华工也给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北方新世界的消息，传播十月革命的思想。一批赞成俄国革命和主张走俄国道路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并纷纷深入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11月起 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欧洲各国工人随之举行总罢工，不少国家先后出现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形势。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陆续成立。

11月 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府通过驻彼得格勒的中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条约、1901年的北京和约（辛丑条约）和1907至1916年期间沙俄与日本就中国问题签订的一切协定，并在承认双方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两国人民主权的基础上缔结新约。

12月 2日 直接靠近中国国境的伊尔库次克建立苏维埃政权。

12月 12日 与中国东北地区关系密切的海参崴建立苏维埃政权。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自此更加直接地渐次传到中国各地。

12月 守卫中东路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驱逐沙俄督办霍尔瓦特，中国军阀张作霖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出兵镇压。（此前中东路局长沙俄皇室贵胄霍尔瓦特于十月革命后悍然宣布“独立”，并纠集远东地区白卫分子先后在哈尔滨、海参崴建立“临时政府”，自称“全俄政府总裁”。这样，中东路沿线就变为沙俄残匪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猖狂进攻的基地。）

一九一八年

1月 11日 张作霖奉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封闭中俄边境，断绝中俄交通。

1月 27日—2月 2日 一些国家社会党的革命派在彼得格勒开会，就建立第三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列宁早在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建立第三国际的迫切任务。）随后，俄共（布）开始在战俘和旅居俄国的外国人中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2月 苏俄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取消过去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时代中国的一切特权，主张援助中国民主独立运动。这一声明发表后，中国社会对苏俄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对苏俄表示好感。天津、北京一部分工人、学生自动建立组织，宣传俄国革命的胜利。

3月23日 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皖系军阀段祺瑞重新组阁。他为了“武力统一中国”，随即制订对宣布“护法”的四川、湖南、广东等省的进军计划。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各派军阀的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

3月25日 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段祺瑞政府互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文本。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假道中东路，乘机在铁路沿线驻军，意图并吞中东路。

4月 外国帝国主义者开始武装干涉苏俄，并策动白匪举行叛乱。

5月21日 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二千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

春 自1918年起至1919年初，《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陆续发表和译载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革命的文章。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人民中逐步扩展开来。

7月1日 李大钊发表中国人民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伟大历史意义，启迪中国人民“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夏 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为了同列宁建立联系，孙中山还在上海设法通过许多中间媒介送给列宁一封信，祝贺他的成功和支持他继续进行斗争。列宁收到信后非常感动，他把这封信看做是“东方的曙光”。

8月1日 列宁委托当时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复函孙中山。复信首先对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的领

袖”致敬。信中热切表示：“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南、西、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的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让我们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可惜这封信未能及时送到孙中山手里。

8月24日 段祺瑞政府公布《海参崴宣言》。表示参与武装干涉苏俄。宋焕章部入侵苏俄国境。

11月 李大钊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他将十月革命譬喻为“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赞誉由此而开展起来的世界革命“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2月15日 苏俄“华工联合会”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书说：“中国工人应该记住，中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

12月24日 鉴于英国工党领导人向各国社会党人发出呼吁，建议于1919年1月6日在洛桑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以恢复第二国际，俄共（布）中央发出无线电报，号召一切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拒绝参加“假借社会主义名义的工人阶级敌人的代表会议”，并呼吁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在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的第三国际周围”。

12月27或28日 列宁会见德国“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后写信给契切林，决定为建立第三国际而努力。列宁指出：“为了建立第三国际，我们应赶快（在‘斯巴达克联盟’成员离开之前由中央委员会批准）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并说：“我们要把坚决摒弃‘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名称而改称‘共产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讨论。”列宁还提了一个可能参加会议的党派的名单。

一九一九年

1月18日 帝国主义列强讨论分赃的巴黎和会开幕。

1月24日 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俄、德等国八个共产党的代表外，还有欧美、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组织的代表。会议讨论了第二国际彻底破产后世界革命的形势和成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决定以八个党的名义发出邀请书，邀请三十九个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成立大会。

代表会议发出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提出了“夺取国家政权”，“组织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剥夺资本和废除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将其变为全民财产的杠杆”，“解除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武装，而把全体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联系”等纲领性的目标和策略，确定了对待第二国际各种类型政党的态度。邀请书建议，“这次代表大会应命名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各个党将是它的支部。”

1月末 中国报纸刊载了外电关于共产国际即将召开第一

次代表大会的报道。

2月20日 南北“和平会议”在沪开始，但不久即告停顿。

2月 李大钊最早关心共产国际的建立问题，表示了热情欢迎的心情。他著文说，“为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又说：“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尽管李大钊和其他先进分子十分关心俄国革命并努力探索使中国革命同俄国革命相联系的途径，但当时中俄交通隔绝，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还不可能建立联系。

3月2—6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二十一个国家的三十五个政党和小组的五十二名代表和一些国家的观察员。大会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就议程的主要问题即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做了报告。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解散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等文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际团结而斗争。大会选举了有列宁参加的作为领导机构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七名委员都是欧洲各国的代表。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书记巴拉巴诺娃、沃罗夫斯基，都是俄国人。鲍罗廷积极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工作，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在绝无可能接纳来自中国的代表的情况下，大会邀请了“旅俄华工总会”负责人、十月革命前到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刘绍周（即刘泽荣）、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的名义列席了会议。3月5日，刘绍周在会议上发了言。他回忆说：“我在

会议上作了简短的发言，除代表中国工人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外，还谈了一下关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1919年3月6日《真理报》刊载了他的祝词。会议期间，列宁亲切地接见了刘绍周、张永奎。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不多，许多国家还没有正式成立共产党。列宁在1919年4月份曾经说过：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树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号召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团结在这面旗帜的周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37页）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进一步完善有待于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完成。

4月29日 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完全无视中国作为参战国的主权，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5月4日 在十月革命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影响下，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时，中国产业工人已有二百多万人，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革命历史舞台，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积极投身工人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密切注意。后来，共产国际所以派使者到中国来，就是因为共产国际东方组织“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发生了几百万工人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从而才派人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5月28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

5月 李大钊为《新青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6月3日 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新阶段，更加广泛地向全国范围发展。

6月5日 南京、武汉和其他城市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

6月10日 在全国人民奋起斗争的形势下，北京反动政府被迫下令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6月28日 巴黎和会闭幕，中国代表在举国群众的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7月1日 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总会在北京，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会员成分比较复杂，进步的成分利用这个组织进行一些宣传活动，邓中夏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7月25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发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称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表示：“劳农政府已将俄皇政府自中国东三省及其他各部夺得之一切战利品，任该地人民自行决定其处于何政府之治内，及籍隶何国”，“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不过，当时历史上割让给沙俄的领土大部分还操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谢苗诺夫白匪手中，宣言实际上是要中国政府采取反对谢苗诺夫的行动。

夏 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民族部负责人的布尔特曼曾从外国干涉者占领下的海参崴来到天津。据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此时李大钊与他建立过某些联系。

10月10日 孙中山正式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党名加“中国”两字，以示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并公布规约，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11月20日—26日 欧洲十四国革命青年组织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会上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即“少共国际”)。苏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代表拉扎里·沙茨金参加了大会，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设在柏林。

11月 高尔察克政府溃逃。高尔察克本人于11月27日在下乌丁斯克被擒。这对于以后打通中俄交通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二〇年

年初 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月18日 在列宁指导下，苏俄筹建远东共和国的托姆斯克会议进入筹备阶段，并已开始发挥作用。

2月17日 北京政府宣布撤回侵俄军队。

3月 北京政府派边防军负责人张斯麿陆军中将同苏俄使者接触。

△ 长期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拉狄克开始担任共产国际书记。

春 俄共(布)远东局(第三国际东方局前身)海参崴支部负责人之一威廉斯基(又名西伯利亚科夫)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要求派一个小组到中国去，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

3月以后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称马克思研究会)在我国各地陆续成立。(这是一种公开的群众组织，参加人数较多，成员也比较复杂。后来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有时就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出现，或用以作为掩护。)

△ 第三国际东方局派遣以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为首的一个小组以筹办“俄华通讯社”和担任俄文《生活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到中国，目的是了解情况和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他同来的有秘书或助手马迈耶夫（一译马马耶夫）及夫人，翻译杨明斋和魏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他们在北京与来自海参崴的布里亚特族人萨赫扬诺娃会合。（魏金斯基又名扎尔欣，是1918年的俄共党员，从1920年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先后担任过远东处处长、东方局副局长。他和片山潜、马林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远东处成员。马迈耶夫是一个苏俄青年军官，从中国返回苏俄后1924年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以后又再次来中国。他曾在广州担任加伦将军的助手，后来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北伐时任第七军李宗仁军部的顾问。杨明斋，山东人，帝俄时由山东去西伯利亚半工半读，又去莫斯科生活十余年，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

魏金斯基通过在北京大学教书的鲍立维（又名柏烈威）和伊万诺夫（伊文，中文名为伊凤阁）（均为俄国流亡分子，但同情十月革命）的介绍，与北大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会晤，并在李大钊主持下同北京一些进步人士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进行过几次座谈，报告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对外政策。后来，经李大钊介绍，魏又到上海（马迈耶夫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进行建党准备工作）同陈独秀会谈，并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和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意见。他当时接触的还有进步刊物《星期评论》社的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及其他人。这时，和魏金斯基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张有时为魏担任英文翻译。魏金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

魏金斯基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建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北京、武汉、济南（有材料说，魏金斯

基和杨明斋赴沪途中曾在济南与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接触。）、长沙、广州等地也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共产国际最初派来中国的是苏俄俄华通讯社社长，接着有朝鲜人巴克京春到中国组党，以后又有米诺尔、别斯林、亚列格塞夫、敏诺等来中国。由于他们起的作用不大，一般认为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一个代表。）

4月6日 为了适应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根据列宁的倡议，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成立。这个位于苏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缓冲国”与中国接壤，成了苏俄对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和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前进基地。这时，苏俄远东与哈尔滨的铁路联系开始恢复，北京政府和远东共和国都准备派出使团，沟通关系。封闭两年之久的中俄交通可望重新打开。

4月13日 以优林（金托夫特—捷瓦托夫斯基）为首的远东共和国政府代表抵达北京，北京政府表示冷淡。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已为中国人民所知，苏俄代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4月27日 针对欧美一些国家中出现了一批所谓共产主义“左派”，以及各国党的队伍中出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节，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无产阶级党必须建立严格的集中制和纪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坚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列宁还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批判了“左派”共产党人对待反动工会、议会斗争和妥协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这对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月1日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分别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广州有五万人参加集会。

△ 《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新青年》还发表了《对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和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同时，陈独秀到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了《劳动者之觉悟》的演说，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人最有用，最贵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出现了新的高潮。

△ 孙中山为《新青年》杂志《劳动节纪念专号》题“天下为公”四字。

5月 朝鲜劳动党在伊尔库次克举行成立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舒米亚茨基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致词。

6月 张斯麿使团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上乌丁斯克。中俄交通随之正式打开。

7月5日 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致电孙中山并转全国同胞，请求：（一）协助中国青年的革命事业；（二）即行承认苏俄，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苏俄；（三）即派代表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四）设法使旅俄华侨能顺利回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俄方面愿意同孙中山建立联系，促进中国革命事业，以及期待中国牵制外国干涉苏俄的愿望。

7月11日 直皖战争爆发，不久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直奉两系开始控制北京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立即邀请优林使华，试图用支持苏俄的办法取得满洲和新疆的安定局面。

7月中旬 在准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针对第三国际成立后出现的一些情况（第二国际中一些最有影响的政

党，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工党、英国独立工党、法国社会党、美国社会党等，改变斗争策略，纷纷申请加入第三国际，以便欺骗群众，从内部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列宁写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指出，“第三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动摇的、不彻底的集团削弱的危险”，因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各国党内斗争的一个主要任务。为了能顺利完成此项任务，列宁指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7月19日—8月7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有二百多人出席，代表三十七个国家的六十七个共产主义组织。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纠正“左派”幼稚病，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第三国际，研究和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讨论民族殖民地等问题。

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但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划清界限，而且还要从组织上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政党彻底决裂。

为了防止机会主义的侵蚀，捍卫共产国际的纯洁性，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大会还根据列宁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思想，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列宁在大会前夕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在

大会上作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为共产国际制订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路线、方针提供了理论和策略依据。列宁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就是说，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

列宁还指出，在封建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无产阶级政党要特别帮助这些国家中反对封建地主的农民运动，“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在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革命的退潮和注意力转向东方。大会代表主要来自欧洲各国，但也有靠近苏俄的一些亚洲国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等）的代表与会。为了加强民族和殖民地工作，大会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列宁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指定墨西哥的代表印度人罗易参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制订工作。长期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的荷兰人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也参加这个委员会，担任秘书。他在会上曾专门介绍他领导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的经验。刘绍周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罗易对于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能起重要作用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几经讨论也未能统一。最后经过列宁的工作，罗易写